

劳动群众是科学技术的主人

——深批林彪鼓吹“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一室大批判组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和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一样，极力鼓吹“克己复礼”，阴谋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妄图从根本上改变我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历史的倒车，从儒家孔孟之道的垃圾堆中寻找反革命理论，用来麻痹广大劳动人民，为推行他的反动政治纲领服务。

林彪之所以把孔孟之道奉若神明、视为至宝，是出于他反动阶级的本能，出于他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搞复辟资本主义的心。历代反动派都是尊儒反法的，用孔孟之道欺骗、奴役劳动人民，他们都主张倒退、反对进步；主张保守、反对革新；主张复辟，反对革命。因此孔孟之道成为历代反动统治者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也是反动派搞复辟、反对革命的思想武器。

林彪极力鼓吹“天才论”、“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贬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学着孔老二的腔调把自己打扮成代表上天意志的“圣人君子”、“天才”、“天马”，无非是要广大人民群众俯首帖耳地听从他的摆布，任从他奴役和欺压，而永远不要“犯上作乱”，好让他“调动一切”、“指挥一切”，恢复他们地主资产阶级已经失去的“天堂”。当前在这场批林批孔运动中就要深批林彪“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揭露其极右实质，肃清其流毒。这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为我们强大的战斗武器，把这场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人的知识、才能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对于这些问题从来就有两种对立的思想。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切知识、才能只能从社会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而林彪却以“至贵”、超人自居，又说什么“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这个谬论是来自孔孟的“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所谓“共同创造”就是指英雄创造历史，奴隶不过是英雄的一种“会说话的工具”，不过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下愚而已！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林彪鼓吹的种种谬论，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还其本来的面目。

人类有史以来的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是劳动人民用革命的暴力反抗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推翻了一个个反动腐朽的王朝，把社会推向前进。人类在与自然界进行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中，由认识自然到逐步掌握客观规律进而改造自然，使科学技术不断得到发展。所以自然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完全是通过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而取得的。可是长期以来资产阶级惯用“天才”造科学、“灵感”出科学的奇谈怪论，什么“心有灵犀一点通”，似乎用不着实践，光靠少数“天才”关起门来心血来潮、灵机一动就能创造奇迹，把科学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归功于少数“上智者”的发明，把广大劳动群众的历史作用一笔勾销，完全抹煞。这是十足的反动唯心史观。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等，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这已是举世共知的事实。就拿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微生物学”这一学科来说，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早已把微生物广泛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无论在酿造、食品、医药、农业、食用菌的栽培和冶金等方面，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生产经验，并且留下了许多历史资料及著作。

我国殷商时代（公元前十七世纪）的甲骨文中有酒、醴（甜酒）等不同酒名的文字记载。说明远在三千多年前已经开始利用微生物了。

南北朝时魏末《齐民要术》一书是贾思勰“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及老成，验之行事”而编成的，他引用古代许多书籍，采用农民口传的农事歌谣三十多条，访问许多老农，经过实际的生产检验而记载下来的。书中介绍了各种不同酒曲的作法，有关酿造项目已经很多了，有曲、酱、酢（即醋）、豉、菹、酪、鲊（即肉类的酶解）、饧及饴等。此外南宋朱翼中著《北山酒经》、明代宋应星著《天工开物》等都记载着许多微生物应用的高超技艺。《天工开物》第十七卷“曲蘖”中有关于酒母、神曲、丹曲的培养方法、操作过程、注意事项等记载。例如其中有“曲工盥手与洗净

盘算，皆令极洁，一毫滓秽，则败乃事也”正确的描述了以无菌操作培养纯种，避免杂菌污染的方法。

我国古代距今两千多年以前就知道采集野生菌类供食用。距今一千多年以前的唐代已经详尽地介绍人工栽培食用菌的具体方法。比西欧最早的法国人工栽培洋蘑菇早一千年以上。

东晋有书记载“小麦黑蚜”。《齐民要术》上不但记载着引起植物病害的病菌，而且知道避免连作、实施轮作可以防治的办法，例如“种麻第八”中说：“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故墟亦良，有点叶夭折之患……”这上面讲的就是麻立枯病。

唐代有书记载“小麦奴”，明代有书记载“麦擎”等不同菌类名称，就是指现在的小麦散黑穗病和小麦腥黑穗病，并且还谈到“乌郁”：“菰首小者，擎之内有黑灰如墨，名乌郁，人亦食之”。《本草纲目》内还有水稻、小米、桑树病害的详细记载。

一千五百年前的《齐民要术》还记载了种过豆科植物的土壤特别肥沃，与豆科植物的根瘤菌联系起来，并在农业上实施轮作。而国外十九世纪在研究了土壤微生物后才知道根瘤菌的。

中国古代把各种菌类作为草药医治疾病。

在一些医学书中用茯苓、猪苓的就有四十个左右处方。现在知道茯苓含有茯苓酶、麦角甾醇、葡萄糖、果糖等成分，是常用作利尿、强壮剂。此外马勃、灵芝、木耳、香蕈、红曲、雷丸、桑黄、鬼盖、冬虫、夏草等自古以来就是中草药中的常用药剂。

预防天花的“人痘”也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伟大创造，相传宋代有种痘的记载，“至七日发热，后十二日正痘已结痂”的描述。种痘术在十七世纪经土耳其传到欧洲，至十八世纪在“人痘”的基础上发展为“牛痘”。这是我国在世界医学史上的一大贡献。

东晋有治疗狂犬病的医方：“疗狗咬人方：仍杀所咬犬，取脑傅(同敷)之，后不复发。”后来直到十九世纪末期法国巴斯德研究小组在制备狂犬病疫苗时屡遭失败，后来才发现狂犬病病毒在脑和脊髓中生长，从而把它接种在家兔的脑中获得了成功。

我国还有最早利用微生物冶金的历史，九百年前，胆水浸铜法，已开始应用于生产。

公元十一世纪，我国在宋代就已有三个大的胆铜场，其中江西信州铅山地方，胆铜年产量达三十八万斤。有书记载：“信之铅山与处之铜廓，皆是胆水，春夏如汤，以铁投之，铜色立变。”这里说的“胆水”，就是铜矿石经过“氧化硫铁杆菌”微生物的催化作用所产生的硫酸铜溶液。公元前七一六世纪已有利用微生物冶金的文字记载：“石脆之山，其阴多铜，灌水出焉，北流注于禹，其中多流赭”。此外在西汉、宋朝也有这方面的记载。

除了在各种生产实践中应用微生物外，还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总结的著述如：

在《汉书·艺文志》中有对菌类的详细记载，宋代的《菌谱》记载了浙江所产的菌类共十一种，此外附带的提到“灵芝”、“天花”、“蘑菇蕈”、及一种有毒的“杜蕈”，共十五种，详述了这些菌类的发育、生长、采收、特征、特性及食用方法等。明代有《广菌谱》，记载菌类十余种。清代有《吴菌谱》等都是专门研究菌类方面的重要文化遗产。

千百年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中对微生物应用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知识，创造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所有这些知识和经验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绝不是什么“超人”、“圣人”、“智者”凭空想出来的，无数事实都雄辩地证明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个英明论断。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解放以来，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微生物在各个领域也广泛应用，迅速发展。由于科学研究密切联系生产实际，我国培养了一支微生物应用与科学实验的科技队伍并且填补了微生物学科的许多空白点。一九五八年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掀起了群众性的微生物科学实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科学事业的发展。工农兵是科学实验的主力军，革命的科技人员走毛主席所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道路，下厂下乡，广泛开展科学实验活动，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教导，攻尖端、破难关。工人阶级提出的豪言壮语是：“我们有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冲破了帝、修、反对派实行的经济封锁，使许多应用微生物的项目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产品、新品种、新材料、新工艺不断涌现。

在农业生产上土法上马，生产“九二〇”、“七〇二”等植物生长刺激素；“五四〇六”抗生素肥料；“青虫菌”、“杀螟杆菌”、“白僵菌”等微生物杀虫剂；“灭瘟素”、“春雷霉素”、“放线菌酮”等农用抗菌素；“鲁保一号”微生物除草剂；发酵饲料；“布病羊型五号”等多种微生物兽药等。从事微生物生产、应用的专业队伍有很大发展。在群众性的微生物科学实验中涌现了象叶洪海同志这样的先进典型，生动地说明了“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叶洪海同志是北京部队某部的一个普通饲养员，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由于他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为人民搞发明创造的

雄心壮志，经过刻苦努力、反复试验，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既节省粮食，又容易为工农兵所掌握的“中曲”发酵饲料，为大力发展养猪事业作出了贡献。

在工业生产上各种酶制剂被广泛应用于食品、纺织、印染、皮革、造纸等工业。我国新兴的石油工业也利用微生物进行勘探、二次采油、石油精炼脱蜡等。在医药工业上我国已能生产几十种抗菌素，不仅自给，还出口支援亚、非、拉地区人民，并且能生产上百种疫苗、菌苗、类毒素、抗血清等生物制品。

此外，在工业污水处理、细菌冶金、转化甾体结构生产口服避孕药物、开展综合利用等方面，微生物亦显示了出色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是向海洋要宝、从矿物里取食品，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而林彪对这一切进行恶毒攻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描绘得漆黑一团，说得一无是处，攻击知识分子走光辉的“五·七”道路。对科学技术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大搞群众性科学实验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林彪用反动的唯心史观污蔑劳动人民是下愚，是天生就应该被他统治，大肆散布群众落后，到处鼓吹孔老二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推行历代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

林彪散布劳动人民“下愚”是为了标榜他们自己是“上智”，他否认人的正确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说什么：“人有先知先觉”，他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说什么：“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这一切已充分暴露了他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叛徒嘴脸和害怕人民、仇视人民的险恶用心。

人的正确的认识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毛主席教导我们：“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革命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因此坚持实践第一首先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牢固地树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而林彪鼓吹“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政治骗子，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念念不忘的是“克己复礼”，他“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要学习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彻底革命精神，狠批林彪和他贩卖的孔孟之道，让他的骗子哲学和一切反动言论彻底破产，从而增强我们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

我们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誓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